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89-2412-H-004-018-K8

新聞報導如何再現事實？ 語言層面的探討—社會結構、語言  
機制與認同構塑：美麗島事件做為個人經驗與集體記憶的認同構塑

研究主持人：翁秀琪

協同研究人：蔡篤堅、陳順孝、林麗雲

研究助理：許雲凱、巫維珍、傅向紅、賴玉釵、林怡瑄、張大裕

執行期限：中華民國 88 年 8 月 1 日至 89 年 11 月 30 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 集體記憶與認同構塑--以美麗島事件為例

翁秀琪（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語言再現真實時所涉及的概念及過程，選擇台灣當代史上最具關鍵性的歷史事件之一的美麗島事件作為分析的對象，從集體記憶的理論角度探討主流媒體以及行動者（特別是本文所研究的四家主流媒體的工作者）是如何透過對於美麗島事件的文字報導和口述歷史報導來建構集體記憶並以之來影響國家和族群的認同。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本文發現從 1980-1999 四報對於美麗島事件的報導，幾乎可以說是付之闕如，除了 77/78 兩年對於許信良叛亂案（許信良當時偷渡返國，面臨叛亂罪的起訴）的報導，以及 88 年則因為黃信介的去世以及美麗島事件二十週年慶，才有了稍多的報導篇幅。

如果從集體記憶的理論來看，則集體記憶的建構者與被建構對象所握權力的大小，會影響集體記憶建構的內涵。Baumeister 和 Hastings(1997)的研究曾指出選擇性遺漏、怪罪仇敵 (blaming the enemy)、歸咎環境 (blaming circumstances) 等集體記憶的運作機制，都可在本研究中得到證明。另外，當年美麗島事件的「叛亂犯」，如今都已是台面上的人物，自然對於「美麗島事件」此一歷史事件該如何被記憶，擁有大別於二十年前的歷史詮釋權。

正如 Woodward(1997)所說，認同透過語言和象徵系統被賦予意義，而差異型塑認同，創造差異因此是分類系統中最重要元素。而 Gillis(1994)也指出大眾媒介「儲存」並「分類」的過去，使這種對於過去（美麗島事件及其相關社會行動者）所建構出來的集體記憶，成為當代人合理化權力的資源，其力足以凝聚集體行動，並加強認同的運作。

關鍵字： 集體記憶 認同構塑 再現 分類系統 創造差異

##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 ■ the Case of "Kao-Hsion Incident"

author: Shieu-chi Weng

####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with the help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oral history, this study tried to analyze how mainstream newspapers and journalists "represent" the Kao-hsion Incident.

This study found that "how" and "what" will be represented in the mainstream newspapers depend upon the power- rela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or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ose who were the object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be it an incident, a single person, or a group of persons.

Woodward(1997) mentioned, that through language and its building of symbol systems, identity first gains its meaning. Since difference constructs identity, thus the creation of difference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and mechanism of the creation of identity. Gillis(1994) pointed out, that mass media saved and categorized our human past, and throt it mass media helped to 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society. This becomes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which triggers collective action of society and reinforces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es of identity.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Categorization system   the creation of difference

集體記憶與認同構塑--以美麗島事件為例  
翁秀琪（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關鍵詞：集體記憶 認同 族群認同 國家認同 語言與再現

壹、問題意識與研究架構

本文探討語言再現真實時所涉及的概念及過程，選擇台灣當代史上最具關鍵性的歷史事件之一的美麗島事件作為分析的對象，從集體記憶的理論角度探討主流媒體以及行動者（特別是包括主流和當年黨外雜誌在內的媒體工作者）是如何透過對於美麗島事件的文字報導和口述歷史報導來建構集體記憶並以之來影響國家和族群的認同。

在近代台灣史發展中，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分歧是最顯著的政治、社會、文化分歧的源頭。因此，「國家認同」以及「族群認同」可以說是目前台灣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當前「民族國家」概念的影響之下，多半談國家認同，必會先談「民族主義」這個概念。以目前台灣的狀況觀之，是一個新興的「台灣民族主義」和傳統的「中國民族主義」相互對抗、競爭的狀況。這樣的情形，展現在民間就是一個「台灣人 vs. 中國人」的論述，展現在意識型態上，常被稱為「統 vs. 獨」的意識型態之爭。（翁秀琪、陳慧敏，2000）至於「族群認同」，王甫昌在「社會變遷下的台灣族群關係」一文中指出：「『族群』作為一個群體的特殊性，主要是表現在人們如何想像誰是、或誰不是屬於同一族群的方式上...。」（王甫昌，1998:31）

然而，認同畢竟是一個非常細緻、複雜的過程，絕非本質主義者對號入座的思維方式所能含括。因此，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恐非一種線性關係。台灣民眾的國家及族群認同，更必須考慮台灣的歷史發展：日本殖民、國民黨統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帶入了西方及日本的文化與價值觀。也因此，在台灣，大多數人所擁有的恐非單一的認同，而是一個或數個由不同的族群、文化屬性、價值集叢所組成的認同體，其中蘊含著個體在建構其時間（年齡、個人經驗、集體記憶）、空間（族群、居住地）以及觀點（政黨傾向）時所呈現的差異、含括和排除（我 vs. 別人；我群 vs. 他群）。

在人們認同形成的過程中，大眾媒介的論述無疑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在瞭解大眾媒介的內容，對於影響台灣民眾族群認同和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視野影響深遠之歷史事件 -- 美麗島事件，是如何運用語言記錄、報導、評論和再現這段史實之後，我們發現「差異的範疇劃分是認同及代表認同的各類符號得以運作的主要基礎。認同是具有某種價值判斷的。認同是一種社會區別、分類的過程，其蘊涵了突顯和隱藏了衝突、矛盾，屬於精神心理層次的論述。而所謂的分類系統係源自於涂爾幹神聖－污穢的概念，無非是透過一組互相仇恨對立關係來區分我群及他者。所以創造差異是分類系統中重要的元素。社會秩序透過二元對立來維持，並創造了不同類別在社會結構中以文化和象徵體系為媒介來完成分類系統。」（翁秀琪、陳慧敏，2000, p.6...9）

本文延續前此之研究，想從集體記憶的理論角度進一步解決以下的問題：

- 一、主流的大眾媒體自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以來，針對事件定位、行動者（事件參與者）進行了什麼樣的集體記憶建構？對於「美麗島事件」該如何被記憶，歷年來在媒體上有什麼樣的討論？
- 二、這樣的集體記憶論述中隱含了什麼樣的國家民主化視野與省籍關係意涵？如此的論述又隱含或明示了什麼樣的族群或國家認同？
- 三、時空的轉變，對於大眾媒體建構「美麗島事件」做為集體記憶對象的實質內涵是否有影響？

本文透過這樣的研究，試圖捕捉過去與現在，事件與過程，以及行動與結構三者之間的邏輯，而這正是當代傳播學門（以及許多學門）所面對的最嚴肅的認識論上的問題。

爲了回答上述三個研究問題，本文將以針對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及自立晚報四家報紙自一九八〇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次年）對於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及黃信介去世的報導進行論域分析，並以之與作者去年的研究（翁秀琪、陳慧敏，1999）做比較，以瞭解事件發生迄今的二十年來，主流媒體是如何針對事件定位及行動者進行集體記憶的構塑（註一）。本文進一步以時報出版，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輯的《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一書的口述歷史內容作為研究的對象，其中特別注意相關媒體工作者的口述歷史整理。

## 貳、重要概念

### 一、認同

Hall 在「誰需要『認同』」一文中指出，認同絕非本質主義所說的認同，而是一個片段與變動的過程，是使用歷史、語言以及文化資源以變成(becoming)而非是(being)某一個特定主體的過程。(Hall, 1996a) Hall 更進一步指出，認同這個概念，指涉的是論域輿論域實踐召喚特殊論域中的社會主體，以及行動者(agent)被產製為主體的過程。認同同時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一方面行動者被論域實踐召喚，另一方面行動者也實際涉入此一行動位置。因此，認同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有效的接合過程，是一種構連(articulation) (Hall, 1996a)，而這種構連是有其政治效力的(political consequences) (Hall, 1996b)。

Woodward(1997)對於認同的討論與 Hall 相同，也是強調非本質論的研究取徑，認為認同必須透過符號建立(symbolic marking)，並關連到他者。而社會區隔與符號建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認同作用過程，缺一不可。符號建立指涉我們如何感知社會關係與社會實踐，社會區隔則說明差別的範疇劃分如何在社會

---

（註一）加入對於林宅血案的報導，因該案與美麗島事件無論在發生的時間上或事件內涵意義均與美麗島事件密切相關。加入黃信介去世的新聞報導，則在於捕捉當年美麗島事件「行動者」的相關集體記憶建構軌跡。

關係中具體化。研究者在研究認同時必須解釋為什麼人們會選擇特定的認同論域(discourse of identity)所支持的位置(position)與認同；另外，除了社會與符號層次，還必須連結心裡層次的解釋，以概念化認同。如此地描繪認同，開放了一個相當具彈性的視野，可兼顧認同因時地變遷的特殊性質，使我們能深入地探索分析美麗島事件時台灣大眾媒體呈現的符號與區隔、個人心理和社會文化變遷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對於認同理論的進一步討論，亦可參考翁秀琪、陳慧敏(2000)，特別是 pp.8-13)

## 二、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和認同的關係是什麼？為什麼研究認同要把集體記憶這個概念帶進來？從集體記憶建構的過程中，是否可查知認同的趨向？

### (一) 阿伯瓦克(M. Halbwachs)對於集體記憶與認同變遷的討論

二十世紀初，許多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都對於人類的記憶相當有興趣，他們共同之處是：將個人記憶放在社會環境中探討，這就是「集體記憶」。(王明珂，1993)著名學者 Halbwachs、Frederick Bartlett、L. S. Vygotsky 均曾針對集體記憶的形成和傳承等提出他們的看法，三人分別從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及心理學角度研究記憶/集體記憶，一般被稱為「集體記憶三大家」(王明珂，1993)，本文僅針對阿伯瓦克對於集體記憶與認同變遷的關係提出討論。

Maurice Halbwachs 師承涂爾幹，因此對社會群體格外關注。他對於集體記憶的討論可綜合成以下三點(王明珂，1993; Coser,1992; 邱澎生譯，1993)：

A、族群凝聚：各種集體記憶都有其對應的社會群體，七〇年代研究族群的學者，常為工具論及根基論爭論不休，工具論者認為族群認同是維護、爭奪現實利益的工具，是易被利用的；根基論者則認為生長環境給予個人一些特質，由此產生的族群感情不易改變。它們的共同點是：『共同歷史』對族群的凝聚非常重要。且歷史起源不見得是客觀事實，也可以是主觀上重建的過去，如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傳承的文化解釋等。

B、認同變遷：歷史記憶可以凝聚族群，經由選擇性遺忘和記起，有了不同的認同。由於族群是以共同歷史記憶來凝聚，因此族群認同變遷也是以凝聚新集體歷史記憶與遺忘舊記憶來達成。新的歷史集體記憶可由找尋、選擇、重組過去來達成，因此歷史學家所作的工作，經常只是將族群體系合理化，在另一方面，我們對過去的遺忘，也就是結構性健忘，經常由不刻意保存文獻及有關文化，或因口頭傳承與間斷所致，而其根本原因經常是現實環境變遷導致人群認同變遷。由此觀之，歷史作為一種社會記憶，也與個人回憶功能相似，是對過去作合理化的解釋與重建。

C、民族體形成：民族亦由集體歷史記憶來凝結傳遞，以創造和追溯共同的歷史記憶，維持、修正族群邊界。任何人都可藉由歷史記憶來遺忘集體記憶，進、退某民族體。

綜上所述，集體記憶是種凝聚的策略，各民族國家中的社會行動者多會以之

來增加群眾對某群體、社會、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因此，研究認同從集體記憶著手，不失為一個妥適的途徑。至於集體記憶有何特色？如何形成？又是怎樣傳承呢？更迭之勢從何而起？

## (二) 集體記憶的特色

Zelizer(1995) 曾系統性地整理出集體記憶的六大前提，我們也可以視為集體記憶的六大特色：

1. 集體記憶是過程的，不是固定不變的。
2. 集體記憶是不可預測的：記憶並非線性、符合邏輯或全然理性。它與時間的關係也不是線性的，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回憶，因此對於過去有不同的記憶，例如過去尊蔣介石為「民族救星」、「世界偉人」，今日則直呼其名諱或貶稱其「老蔣」。集體記憶也會藉助空間來建構，例如建二二八紀念碑，有時甚至會藉虛構的空間（例如 Halbwachs 對 Holyland 的研究）來建構集體記憶。
3. 集體記憶是部份的，不可能是整體的。
4. 集體記憶是有用的，具社會、政治和文化聯繫的功能。
5. 集體記憶具特殊性和普遍性。
6. 集體記憶具物質基礎，它不只存在人們的腦海中，它也是具體存在於論述、日記、紀念碑、儀式、服裝、博物館、大眾媒介報導中的。

(三) 影響集體記憶的因素有哪些？集體記憶又是怎樣傳承呢？更迭之勢從何而起？

### 1. 社會行動者所擁有的社會地位及權力大小

Padden(1990) 認為，從語言的流失或死亡可以看出集體記憶的影響因素，他因此從美國手語(American Sign Language, 簡稱 ASL)的例子，看民間老百姓流傳的說法（例如神話或民間傳說）以及 ASL 語言使用者社會地位的轉變，對於一種語言是否能存活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研究發現，語言（特別是弱勢語言）的存活，有賴分享的民眾詮釋(sharing folk explanations)，它會提醒語言使用者注意到「語言在每日生活中的中心位置」，以及更重要的，語言使用者在社會中所擁有的社會地位及權力的大小（註二）。語言的集體記憶因此植基於社群中的人對於該種語言何以必須存活下去的合理化解釋和語藝組織（rhetorical organization）中，ASL 的存活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這種語言集體記憶的運作過程。

(註二)Padden 發現，ASL 語言得以存活，與聾人在美國社會中所能從事的職業的轉變有很大的關聯。1970 年以來，美國聾人工作型態的改變是重要的轉折。在 1960 年代，美國聾人的工作型態主要是：修鞋匠、室內裝事業、印刷業、教師（當時美國對教師的要求不高）或舍監等。聾人過的都是工人階級的生活，即使是教師，也必須在晚間兼做印刷或室內設計的工作來貼補家用。重要轉折是 1967 年成立的 National Theater of the Deaf(NTD)。意義：聾人演員由玩票性質變成可以靠演戲維生的「專業演員」，服務對象從聾人擴大為一般觀眾。1970 年代另一重要事件：聾童教師的專業化。每年五萬名學生的需求量，使得 ASL 教師的專業化成為可能，原先的手語老師變成專業的「語言教師」。

## 2. 意識型態鬥爭、政治鬥爭

Bakhurst(1990) 研究 Vygotsky, Volochinov, 及 Ilyenkov 三位俄國理論家的理論是如何在史大林時代意識型態的惡鬥中， 以及是在何種集體記憶的形式中被保存下來的（註三）。

Bakhurst 的研究讓我們瞭解到，在一個時代裡的意識型態鬥爭、政治鬥爭等，都會影響生活在該一時代的理論家的個人命運、理論建構，甚至後代對該一時代理論家及其理論內涵的集體記憶。

## 3. 社會階級：技術活動 vs. 專業活動

Coser(1992, 特別是 Chapter 7)指出， Halbwachs 將社會分成兩個領域：技術活動領域 (zone of technical activities) 和人際關係領域 (zone of personal relations)。(p.160) 技術活動包含了規範和感知方面的知識和應用，這些規範和感知所指的是技術本身的語言形式（術語）和其功能的姿態；因此技術所擁有的特色大致上都是負面的：它指出了什麼是該做的，並且少了任何一項這些該做的，這個技術的功能將無法達成。這些技術內容的傳遞亦即集體記憶的延續。(p.160)

因此，技術活動是不同於專業活動的，因為專業關心的是當下的問題，所以專業活動毋寧是技術活動和人際網絡關係連結後的活動[例如傳播工作是屬專業活動， 因此若從 Halbwachs 的觀點， 它是無法獨立於現世社會的客觀技術活動， 必須關注與此活動相關的人際網絡關係]。

## 4. 世代、時間因素

根據曼海姆 (Karl Mannheim) 的概念， 世代不是生物上的意義，而是社會創造出來的概念。 也就是說，具有「歷史-社會」(historical-social) 意識的群體，才算真正的是世代。世代的性格是由這群人年輕時所經歷到的事件所形塑的，年輕時所經歷的事件會影響日後的政治態度及行爲。(Schuman and Scott, 1989)

Marques 等人 (Marques, Paez and Serra, 1997) 的研究兼顧個人和社會觀點，探討「禁忌事件」(silenced events) -- 葡萄牙戰爭的由來及影響。當人們面對重大災難（悲傷事件，例如葡萄牙戰爭，或二二八事件）的記憶時，最常用下面兩種機制來處理—結構性遺忘（外力逼迫，使人們避談此事）及世代傳遞（當事人向下一代訴說經驗）。

Marques 等人 (Marques, Paez and Serra, 1997) 以葡萄牙戰爭為例，引用

---

（註三）有關 Vygotsky 的部份特別有趣，簡述如下。蘇俄當局對於 Vygotsky 的三大批判是：(1) 指他為走資派，(2) 他所從事的心理測驗使得工人階級顯得心智較為低下，(3) 過度唯心，強調人際溝通和文化現象等。

俄國官方對於 Vygotsky 的批判，導致他的理論只能透過「口語文化」(oral culture) 來傳遞與延續，弔詭的是，主要是靠批判 Vygotsky 最激烈的 Kharkov group 來傳續。例如 Leontiev 的「活動理論」當時就在 UDSSR 很紅，主張：以物質為主的活動是人類意識發展的基礎，與 Vygotsky 強調人類高層次的心智活動大唱反調。Bakhurst(1990)指出，Vygotsky 的作品是在史大林時代政治鬥爭的祭品，因此當時在口述文化中所呈現的集體記憶，當然是把 Vygotsky 的作品儘量朝「唯心」的那方推，好作為攻擊的靶子。



Halbwachs、Bartlett 及 Freud 的學說，研究社會連帶、情感氛圍及記憶的世代傳遞。 Halbwachs 及 Bartlett 均著重社會力的影響，記憶、遺忘的過程必伴隨社會行動，記憶是外力、偏見篩選後呈現的。 Freud 則認為，個人遭遇不幸事件時，防衛機制會起作用，使個體遺忘負面事件；就算當事人存有記憶，也是不完整、失真的。佛氏和巴氏的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一，兩人都相信記憶伴隨遺忘、摧毀和重構的過程；其二，縱然個體的防衛機制起作用，使其產生合理化過程，但仍得接受社會的框限，換言之，仍然必須符合社會價值，用積極面去看待。

#### 5. 事件的性質

Finkenauer 等人 (Finkenauer, Gisle, and Luminet, 1997) 探討圍繞在國家熱鬧中的瞬間記憶(flashbulb memory)如何被創造和維持。 他們指出，在 1970 年代末之前，記憶一直被認為是個人的財產，直到 1978 年時 Neisser 方指出記憶乃強烈的受許多社會性因素所影響，在這個討論脈絡裡最有趣的是瞬間記憶 (flashbulb memory)。 所謂瞬間記憶是指在人際網絡裡對驚人事件的揭發，所保有鮮明的、精準的、具體的、持久的記憶。這種記憶不易隨時間而被淡忘。至於瞬間記憶的形塑與情緒相關，情緒越高昂和後果越重要則記憶越易形成，而瞬間記憶的維持有賴重演(rehearsal)。

#### (四) 集體記憶的運作機制

集體記憶大家 Halbwachs 在其對於福音書的經典研究中，指出集體記憶的運作機制如下：轉為教條、儀式化、進入各地傳統（為了使事情較為可信，會將事件設定為發生在神聖地，或尋求當地傳統的支持）、時間與空間因素（註四）、尋找地標安置記憶等。(Coser,1992)

Baumeister 和 Hastings(1997)在研究「集體記憶的扭曲：團體如何討好與欺瞞自己」時，相當系統性地整理出集體記憶的七種運作機制：

1. 選擇性遺漏 (selective omission)：選擇性的遺漏令人不悅的事實。
2. 捏造 (fabrication)：創造不實的記憶。
3. 誇張與潤飾 (exaggeration and embellishment)：把某些歷史事實的片段拆解 (blow up) 進團體的主要神話中，以誇大祖先行為的正面和重要性。
4. 連結或分離 (linking versus detaching)：事件通常具有多重起因，將焦點放在其中一個、而忽略其他，就能讓事件的詮釋出現偏倚，而且不需竄改事實即可達到目的。
5. 怪罪仇敵 (blaming the enemy)：藉由歸咎敵人或對手，來降低自己的罪責，

(註四) Bellelli 與 Amatulli(Bellelli, G. and M.A.C.Amatulli, 1997)在研究「懷舊、移民與集體記憶」時也發現，懷舊(nostalgia)具二元性，多因空間因素(例如見到老房子、見到親人)和時間因素(例如特別懷念某一段時光)而產生。其中時間因素更大過空間因素，例如人們對於回到童年時期的渴望會大過回到童年時期的居所。

把自己的罪行解釋為只是對敵人的回應而已，甚至將責任完全推給敵人。

6. 歸咎環境 (blaming circumstances)：歸咎環境，以使自己要負的責任降到最低。
7. 文脈框架 (contextual framing)：大部分的歷史事件包含複雜的因果網絡，而集體記憶則傾向化繁為簡，尋求簡單的詮釋；藉由選擇哪一組因果來強調，人們可以把事件置於特殊的背景中以迎合團體的自我形象。結論 (Conclusions)

總之，團體記憶會以多重方式進行系統化扭曲，以維護團體的正面形象。有時，團體會像極權政體竄改歷史一樣蓄意扭曲；有時，他們只是把事實美化而已。無論扭曲者的動機為何，接收者的角色也一樣值得注意。由於人們總愛去想自己團體好的一面，因此當真相與討好團體的說詞同時披露時，討好團體的說詞比較容易被理解、記憶和複述。

### 三、傳播與集體記憶

Edy(1999)指出，傳播是集體記憶的重要元素。在新聞媒體如何再現集體記憶的文獻方面，Lang & Lang (1989)研究指出，記者使用歷史事件的理由是：劃分年代、作為評量標準、類比、記取教訓。Zelizer(1995)發現記者以「說故事者」的權威角色來建構集體記憶。Shudson(1992)發現，媒體再現的水門事件故事，可以作為分析以後發生的政府醜聞的工具。Zelizer 和 Shudson 都強調記者援用往事對公眾記憶形塑的重要性。

Edy(1999)的研究顯示，記者以多種方式引用往事，包括：對紀念日的報導（又分：事件導向式報導、週年式報導，及訃文式報導）、歷史類比式報導（以歷史事件為工具，去分析當前情境並預測結果）、歷史脈絡式報導（著重解釋現況從何而來追溯往事與現今情境相關的軌跡）。記者的工作透過上述類型的報導，能凸顯往事的意義，增進吾人對現況的理解。不過，記者往往只把集體記憶當作分析和誇大的工具，而忽略集體記憶的建構與維護。

Ma(1999)在研究香港電視媒體的報導對於港人文化認同上的影響時指出，集體記憶研究多從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等角度切入，忽略了現代大眾傳播的影響。Gillis(1994)則指出，大眾媒介儲存並分類了「過去」。此一被中介(mediated)的過去，變成合理化權力的資源，足以凝聚共識加強認同。

國內的夏春祥從「儀式」的角度出發，討論新聞論述與集體記憶的關係。他指出：「...新聞作為一種產生震撼性的儀式。在節奏性循環下，歷史議題不斷浮現的事實，使得新聞成為處理集體記憶的關鍵機制。在當中，過去的經驗被召喚出來，使得人們共同分享對歷史的意象，且能在溝通的狀態下，形成社會認同的基礎。社會群體也可以透過大眾傳播的新聞論述，建立起一個被大家所同意的關於過去的說法，來建構他們自己對所生存世界的印象...。」(夏春祥，2000: 71)

### 小結：

集體記憶是種凝聚的策略，各民族國家中的社會行動者多會以之來增加群眾對某群體、社會、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因此，研究認同從集體記憶著手，不失

爲一個妥適的途徑。由於族群是以共同歷史記憶來凝聚，因此族群認同變遷也是以凝聚新集體歷史記憶與遺忘舊記憶來達成（國家認同亦復如此）。新的歷史集體記憶則可由找尋、選擇、重組過去來達成。傳播是集體記憶的重要元素，大眾媒介儲存並分類了「過去」，使其成爲人們的集體記憶，變成合理化權力的資源，足以凝聚共識加強認同。而社會群體也可以透過大眾傳播的新聞論述，建立起一個被大家所同意的關於過去的說法，來建構他們自己對所生存世界的印象。而許多事件（例如美麗島事件）之所以被記憶，乃是因爲它們喚起人們對事發當時的爭議，而媒體提供一個重要的論壇，讓民眾去爭議、協商如何分享意義。因此研究媒介論域中集體記憶軌跡的轉變，就不失爲研究族群與國家認同變遷的可行策略。

###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資料之取得

本研究採取論域分析的方法，從語言著手，探討社會結構、語言機制與認同建構之間的關係。

有關批判語言學及批判的論域分析，翁秀琪(1998)在<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一文中已有詳細論述，在此不再贅述。由於本文類屬政治論域分析，因限於篇幅，僅簡單從其傳統中爬梳其理論脈絡，並從中擷取本研究的分析策略。

Wodak(1989)指出，研究語言和權力的關係最早可溯及語藝研究，但相關的語言與權力理論則是近期才發展出來的。政治的語言學論域分析注重政治文本的 syntax, argumentation, lexicons, semantics, narratives, rhetorical structures, semiotics and grammar。至於 PLDA 的研究方法，有些研究字彙(words)和意符(signifiers)如何因爲使用者的不同意識型態位置及語言的不同社會歷史情境而有不同。(Seidel, 1985)

另有一類 PLDA 研究被稱爲政治論域過程研究(political discourse processing studies)，以 van Dijk 的研究爲典型。Van Dijk 的言說分析是在一個社會認知架構下進行的，他預設人們會在他們的社會互動中創造出一個共同的參考架構和解釋架構。他在<<種族與報紙>>(Racism and the Press, 1991)一書中，使用內容分析和言說分析的方法從話題(topics)、標題(headlines)和基模結構(schematic structure)來研究報紙對於少數族群的報導。他同時也訪談了報紙的讀者。他發現美國報紙多半將黑人呈現爲罪犯和運動員。新聞的再現機制使得讀者在這些機制中去瞭解並消化(process)新聞內容。(van Dijk, 1991)

De Cillia 等人(De Cillia, Reisigl and Wodak, 1999)在研究國家認同的論域建構時提出五個基本假設：(一)國家是心靈建構出來的(mental constructs)，是一種「想像社群」(Anderson, 1985:15; De Cillia, et.al. 1999:153)，(二)國家認同是社會認同的一種特殊形式，它藉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生產、再生產、轉型、解構，(三)國家認同可視爲 Bourdieu 的「慣習」(habitus)，(四)國家認同永遠與差異建構、特殊性建構相關(Hall, 1994, 1996a;

De Cilia, et.al.1999:153)。(五)並沒有所謂的單一或唯一的國家認同。國家認同並非固定不變的，它往往是變動的、脆弱的、不一致的。

De Cillia 等人運用 Cicourel(1974) 發展出來的三角交叉法原則，研究五種不同類型的政治文本：(1)政治演說，(2)報紙報導，(3)宣傳海報，(4)訪談資料，(5)焦點團體討論資料。他們運用批判的論域分析，就(1)內容/主題 (contents/topics)，(2) 策略(strategies)，(3) 語言學的手段和實現形式 (linguistic means and forms of realization) 等三個層次進行分析。比較重要的是在第(2)層次，也就是策略上的發現。就策略層次而言，他們發現了四種巨觀策略：(1) 建構策略(constructive Strategies)，指的是那些建構國家認同的語言行動，例如「我們奧地利人」。(2) 永存/不朽與合理化策略(perpetuation and justification strategies)。永存/不朽策略就像「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命運的共同體」等用法。合理化策略就像訴諸「法統」，是一種和歷史作連結的策略。(3)轉化策略(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把一種國家認同的內涵轉化為另一種國家認同的手法，例如把「台灣人」的內涵轉化為「新台灣人」的手法。(4)摘除或解構策略(dismantling or destructive strategies)，用來去除國家認同的神秘面紗。這些策略用來建構相同性/相異性，特殊性，自主性/依附性，含括進來/排除出去，整體/局部，連貫/不連貫等與國家認同相關的分類概念，是語言再現真實並促成社會認同(包括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的重要機制。

所有的政治活動必定牽涉到行動者和行動，van Leeuwen 曾專門針對語言如何再現社會行動和社會行動者做過研究(van Leeuwen, 1995; van Leeuwen, 1996)。就社會行動者而言，van Leeuwen (1996) 整理了包括消除(deletion)、重新安排(rearrangement)和替換(substitution)三大類共二十二個次類目，系統地呈現了社會行動者在文本中可能被再現的方式。(亦可參考翁秀琪、陳慧敏(2000)，pp.13-17)

本研究之研究資料共有以下三個來源：

- 一、翁秀琪、陳慧敏的研究資料(1999)。
- 二、美麗島事件相關報導：1980-1999 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立晚報、中央日報四家主流媒體在上述時間內的「美麗島事件相關報導」。至於如何挑選「美麗島事件相關報導」，係根據以下原則：

#### 1.時間樣本

- (1) 當週事件：指美麗島事件發生的那一週(每年的 12/17-12/23)，從 1980-1999 的該時段所有新聞報導即為本文所抽取的樣本範圍。
- (2) 重大相關事件事件：為了避免「當週事件」遺漏了重大美麗島的相關新聞，本研究特選出林宅血案作為樣本選取的指標。林宅血案的當事人林義雄係美麗島政團重要人物，血案發生在 1980 年(美麗島事件次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別具意義，因此特以之為選取本文樣本之重要指標事件。另，黃信介去世相關報導則為另一指標事件。黃信介為「美麗島政團」重要領導人物，並曾擔任民進黨主席，是美麗島事件重要的「社會行動者」，他在美麗島事件屆滿二十週年前夕去世，媒體對他去世的報導可做為我們瞭解主流媒體如何建構集

體記憶的重要指標，因此選為本文樣本。

## 2. 實際樣本：

在「時間樣本」中抽取的只是我們的樣本範圍，而真正的研究樣本則需依賴以下的幾項原則：

- (1)全選原則：只要落於時間樣本的報紙，其「所有」版面（廣告版除外）都是我們的樣本對象。
- (2)標題原則：只要新聞「標題」（不論大標、小標）有我們需要的「關鍵字」時，即是我們最後的研究樣本了。
- (3)我們所稱的「關鍵字」為：「美麗島」、「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

三、時報出版，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輯的《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1999）的口述歷史內容，樣本資料的選取特別著重在相關媒體工作者的口述歷史整理。

## 肆、資料分析

### 一、美麗島事件相關報導：1980-1999

本研究取自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及自立晚報的分析樣本，其刊載日期、刊載版面及新聞標題等，請詳參本文附錄一。下表則呈現二十年來相關報導在四報的分佈概況。

年代 報別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聯合 (n=9)	4									1			1	1							2	
中時 (n=48)	16			2		1	2		2		4	1	5	5	2	1	1			1	1	
中央 (n=44)	28				1			1	1	1										1	11	
自立 (n=37)	13							1	3	2	3	4		1						2	3	5
合計 (N=138)	61			3		1	2	2	6	8	7	5	6	6	3	1	1		3	1	27	5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報導量上以事件次年（民國六十九年）的 61 則最多，其次是美麗島事件二十週年的民國八十八年的 27 則次之，民國七十八年、七十九年兩年則各以 8 則和 7 則分列第三、第四名。

如果以報紙區分，則以中國時報的 48 則最多，中央日報的 44 則次之，自立晚報以 37 則位居第三，而聯合報則僅得 9 則。

整體看來，美麗島事件發生以後，大眾媒體在每年該事件發生的當週，對於事件的報導極為稀少，77/78 兩年的報導，主要環繞在許信良叛亂案（許信良當時偷渡